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禹錫集



4
L
I
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禹錫集 上

《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
卞孝萱校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禹錫集/ (唐) 劉禹錫撰; 《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 (2000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0538-1

I. 劉… II. ①劉…②劉… III. ①劉禹錫—文集②唐詩—選集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唐代 IV. 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87242號

責任編輯: 王秀梅

劉禹錫集

(唐)劉禹錫撰

《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

卞孝萱校訂

(全二冊)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27/8印張·363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2000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2201—6200冊 定價: 36.00元

ISBN 7-101-00538-1/I·82

前言

一

中唐文學是唐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光輝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劉禹錫是一位重要作家。他與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一樣，都是詩歌與散文兼擅。儘管他們各自的側重面有所不同，但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為中唐文學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劉禹錫（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祖先為匈奴族。七世祖劉亮隨魏孝文帝遷洛陽，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曾寓居嘉興（今屬浙江）。劉禹錫的少年時代是在江南度過的。經過東晉南朝的開發，至中唐時期，這一帶的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劉禹錫在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裏獲得了深厚的文化教養，培養了優異的文學才能。他從童年時起就學習寫詩，並受到吳興詩僧皎然的指點。皎然著有詩歌理論專書詩式等，對劉禹錫後來詩歌風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劉禹錫登進士第。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應吏部取士科考試合格，正式踏上仕途。

與唐代多數有成就的詩人一樣，劉禹錫早年並不甘心當一個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

入仕以前，他自稱「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獻權舍人書），華山歌是他的「明志」之作。詩中通過華山的高大形象，寫出自己的抱負：「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入仕以後，抱着施道展志的願望，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入杜佑幕掌書記，參與討伐徐州亂軍。十八年，調任渭南縣主簿，次年任監察御史，與韓愈、柳宗元同在御史臺工作。不久，韓愈遭到貶斥，劉禹錫則與柳宗元等一起在王叔文的領導下研究、討論政治革新問題。

劉禹錫所處的時代，唐王朝面臨着一連串嚴重問題：藩鎮擁兵割據，對抗朝廷，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宦官掌握神策軍，形成了朝官與宦官既矛盾又勾結的複雜局面；朝廷軍費支出激增，稅收地區縮小，造成了財政的困難，由於官府的橫徵暴斂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農民紛紛破產，階級矛盾尖銳。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年），唐德宗病死。以王叔文爲代表的地主階級有識之士爲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和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在新即位的皇帝順宗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劉禹錫由監察御史擢爲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協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財政。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順宗實錄五），可見他是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這次政治革新運動，時間只有一百餘天，却實行了不少進步措施。其中如貶謫貪污殘暴的京兆尹李實，宣布蠲免百姓拖欠的一切租賦，禁絕各種雜稅和例外進奉，罷官市和五坊小兒，放出部分宮女和女樂，整頓財政制度等。韓愈後來在記載這段史實時用了「人情大悅」（順宗實錄二）四字，說明這些措施在當時是得到人民擁護的。劉禹錫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出卓越的才幹。他每日都要親自處理大量來信和接待很多來訪者（雲仙雜記卷五宣武盛事）。

及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紀五二。王叔文稱贊他有「宰相器」(新唐書本傳)。不久，這次運動便在宦官和藩鎮的聯合進攻下失敗了。王叔文被殺，劉禹錫被貶爲朗州司馬。與劉禹錫同時被貶爲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

在貶所，劉禹錫繼續受到迫害。唐憲宗曾下詔書，八司馬「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劉禹錫在強大的壓力下，政治熱情沒有消滅，他仍然留意治道。寫了不少政治諷刺詩，還與柳宗元討論哲學，寫了天論三篇，與元稹討論政治經濟問題，寫了答饒州元使君書，堅持「稽其弊而矯之」的革新思想。

元和九年(公元八一五年)十二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至京。次年三月，劉禹錫因賦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諷刺了新貴，得罪執政，被外放爲連州刺史。後轉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處，都能詢訪疾苦，關心民瘼。長期的貶謫生涯使他的思想陷於極度的苦悶之中。從貶官朗州開始，他就把佛教作爲自己的精神寄託，與僧徒交往頗多。在他的本集中留下了一卷送僧詩。不過，佛教在彌合他的精神創傷方面雖然有一定的作用，却没有銷蝕掉他的鬪爭意志。大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他回到長安，任主客郎中，又寫了一首再游玄都觀絕句。詩中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宣告：「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小序特別註明寫作年月，並說：「以俟後游。」表現了不怕打擊、不變初心的堅強性格。由於裴度的推薦，劉禹錫兼任集賢院學士。集賢院是個儲才之處，有機會出居要職，因此劉禹錫曾說：「幸依羣玉府，有路向瀛洲。」(早秋集賢院卽事)他與裴度、白居易、崔羣

等人聯句賦詩，加深友誼，希望在政治上重新有所作爲。裴度在複雜的政治鬭爭中想採取優游避禍的態度。劉禹錫寫詩勸勉道：「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廟庭偃松詩）他還寫了與歌者米嘉榮等詩，諷刺排擠裴度的牛僧孺、李宗閔等人。後來裴度罷知政事，他也出爲蘇州刺史。他雖然感慨自己「鍛翻方擡舉，危根易損傷」（酬鄭州權舍人見寄二十韻），但政治熱情依然飽滿。當時蘇州正遇水災，他全力救災，賑濟飢民，招集流亡，使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爲此受到「政最」的嘉獎，賜紫金魚袋。蘇州人民後來把他與韋應物、白居易一起稱爲「三賢」，建三賢堂，歲時致祭。後轉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在路經洛陽時，他贈詩裴度說：「終期大治再鎔鍊，願託扶搖翔碧虛。」（兩如何詩）裴令公贈別二首之二）直率地表現了他想借助裴度的力量準備再經受一次政治考驗的願望。朝廷上發生了「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大批朝官被殺，連唐文宗也被宦官所挾持，國事愈不可爲。劉禹錫在同州刺史任上不滿一年，因患足疾，改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退居洛陽，與白居易、裴度聯句唱和，過着「散誕人間樂，逍遙地上仙」（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的生活。這種生活對於人世精神很強、鬭爭意志旺盛的劉禹錫來說，是極不相宜的。當時白居易皈依佛教，元稹、崔羣逝世，裴度隱居綠野堂，他感到孤立無援，一籌莫展，只能發出「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歲夜詠懷）的感嘆。他曾借佛道思想來麻醉自己的精神，但未息的政治熱情仍使他時時頑強地表現出力求振拔的壯志。「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酬樂天詠老見示），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睡眼開」（始聞秋風）就是他晚年的精神面貌的自我寫照。遺憾的是詩人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他自知不久於人世，寫了子劉子

自傳，在結尾的銘文中悲嘆道：「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對自己政治才幹的不能發揮，長抱終天之恨。

劉禹錫一生關心政治，熱愛生活，熱衷於革新，對黑暗腐朽的封建勢力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諷刺，表現了他要求國家統一，使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的進步理想。這是劉禹錫所以能夠成爲一位傑出詩人的重要原因。

二

劉禹錫生前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劉白」。白居易則稱他爲「詩豪」，極爲服膺。他的詩歌，今存八百餘首，內容比較豐富。

首先，他繼承了詩經的美刺傳統，以鮮明的愛憎感情，反映中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和社會上的嚴重弊病。他的政治諷刺詩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抨擊鎮壓永貞革新的權臣、宦官，把他們比作「利翬迎人看不得」的蚊子（聚蚊繇），「瞥下雲中爭腐鼠」的飛鳶（飛鳶操），「笙簧百轉音韻多」的百舌鳥（百舌吟），形象逼真，從不同的角度揭露了他們的醜惡嘴臉和害人本性。詩的末尾往往描寫或預言他們的可恥下場，表現出強烈的憎惡情緒。劉禹錫看到各方面的社會危機，他的不少詩篇爲此而發。當時伴隨着藩鎮割據而來的將驕卒惰問題很爲突出。他在武夫詞中描寫「衣紫襲絳裳」的武夫仗勢欺人的兇相：「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妬名倡。」詩中憂慮地指出，這些武夫正是社會動亂的因

素：「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當時宦官所領神策軍養尊處優，缺乏訓練，沒有戰鬥力。他的養鸞詞就諷刺這種情況：「寧知下韓時，翅重飛不得。毳毼上林表，狡兔自南北。」中唐宦官監軍也是個十分腐敗的現象。宦官不懂得軍事，貪賂公行，賞罰不明，使真正有功的將士被冤屈地埋沒了，而無功的人却扶搖直上：「貴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它人印纍纍。」（和董庶中古散調詞贈尹果毅）他對朝廷加重賦稅，加緊搜括人民的做法表示不滿。調瑟詞就諷刺了這種過重的剝削的有害性。賈客詞則對鹽商勾結官府、牟取暴利的行爲表示憤慨。宦官弄權，專務結黨營私，排斥賢才。劉禹錫和他的友人長期被擯棄不用，內心感觸最深。他的不少詩篇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作了控訴。昏鏡詞勾勒了一個主觀獨斷、予雄予智、專喜逢迎的頑固派官僚形象，並尖銳地加以嘲弄。還有的象：「燕石何須辨？逢時卽至珍。」（偶作二首之二）「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萋兮吟）等詩句，可以說是對賢愚顛倒、摧殘人才的社會的強烈抗議。除了諷刺以外，他的詩歌也有歌頌的一面。憲宗在位的中後期，藩鎮日益猖狂，淮西吳元濟悖逆尤甚，地近腹心，迫使憲宗不能不下決心用兵。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師討伐吳元濟，一舉成功。劉禹錫聞訊後喜不自勝，寫了平蔡州三首，熱烈地表示祝賀。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平定淄青叛鎮李師道，他又寫了平齊行二首，歡呼平叛戰爭的勝利。詩中熱情澎湃，充分表現了他對國家統一的深切關注。

其次，劉禹錫所寫的咏史懷古和抒情酬贈的詩，不僅數量比較多，而且其中不乏傳誦的名篇。他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又長期在大江南北擔任地方官，足迹遍佈大半個中國，所到之處都探訪古迹，寫詩

詠懷。有的是借古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如經伏波神祠：「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抒發了他對於貶謫生涯的怨苦之情。有的是借咏史的形式，曲折地表達了自己不屈的志節，如咏史二首之一：「世道劇積波，我心如砥柱。」他另有詠古二首有所寄，則是勸勉「八司馬」中最先起用的程异的：「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他自稱「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學阮公體三首之三）。在他的筆下，古今是相通的，歷史與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詠史詩、懷古詩成了他諷諭現實的一種得心應手的武器。著名的如西塞山懷古、金陵懷古、蜀先主廟、觀八陳圖、金陵五題等，都是千古不朽的名篇，不僅藝術技巧純熟，思想內容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金陵懷古通過景物描寫，顯示了「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烏衣巷以冷雋的語言寫晉代顯赫一時的王、謝世族沒落後的衰敗景象，借古諷今，暗示時下的權貴不會有比王、謝更好的命運。西塞山懷古寫吳主孫皓設置橫絕大江的「千尋鐵鎖」，却無法阻擋統一的潮流，對企圖割據稱雄的野心家具有警告作用。這些詩都寫得精警超邁，韵味深長。西塞山懷古一篇，古人把它比作「驪龍之珠」，白居易為之擱筆罷唱。

劉禹錫很重視朋友情誼。與友人唱和之作，曾分別編成不同的集子。在貶謫期間，因處境險惡，交游不多，所以酬贈之作數量很少，但內容深刻，感情沉鬱，如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詩，與柳宗元共傷仕途顛躓，同悲知己隔絕，只能彼此相濡以沫，相慰以情，「最爲曲折詳至」（金聖嘆選批唐才子詩卷四）。酬元九侍御贈壁州鞭長句、答楊八敬之絕句等抒寫了對遭貶的友人的同情和助勉，都是難得的佳作。脫離謫籍後，交游廣闊，酬贈之作日多。這些作品多數比較平庸。他與裴度、白居易唱和之作，由

于友誼深厚、感情真摯，不乏佳構，如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歎水別白二十二、秋中晷退贈樂天、酬樂天詠老見示、奉送裴司空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等詩，或述相見的感受，或訴別時的離愁，或互道暮年情懷，或稱頌對方威德，都寫得情深意厚，感染力很強。其悲悼友人的詩篇也很見情誼，重至衡陽傷柳儀曹、哭呂衡州時予方謫居、西川李尚書知恩與元武昌有舊遠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繼和二首等詩，分別悼念柳宗元、呂溫和元稹，都情辭淒切，感人至深。

第三，劉禹錫還認真吸取民歌的營養，創作了一批反映下層社會民衆生活和風土人情的好詩。這部分詩作，尤多名篇。早在貶官朗州時期，他就發現「呖謔俚音，可儷風什」（上淮南李相公啓），對民歌產生了興趣。競渡曲、采菱行等作品以民歌具有的歡樂輕快的調子，歌唱了湘、沅一帶賽龍舟和少女採菱的盛況。這是他學習民歌的起點。在連州時期，他寫的插田歌自稱爲「俚歌」，民歌氣息也很濃厚。詩中讚美了農婦、農夫的插秧勞動，嘲弄了鑽營的計吏，表明劉禹錫對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了較多的瞭解。在夔州刺史任上，他對當地的民歌竹枝詞下了較大的工夫。所作竹枝詞九首描寫了山村居民的勞動生活，歌唱了愛情的歡樂與悲哀，抒發了對官場中爾虞我詐、反復無常的腐朽現象的憎恨之情，內容豐富多彩，取材富於生活情趣，既有奔放的熱情，又有冷靜的批判，開闢出一個前所罕見的新境界。他所寫的楊柳枝詞、浪淘沙詞九首，涉及的範圍也極爲廣泛。有的發表了力主創新的文藝觀（「塞北梅花羌笛吹」），有的表現了作者自己雖歷遭折磨顛簸而毫不動搖的頑強性格（「莫道讒言如浪深」），有的贊頌淘金女郎的勞動（「日照澄洲江霧開」），都能從不同的側面顯出他的進步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描寫少數

民族風土習俗的詩篇如蹋歌詞、莫徭歌、畚田行等，對研究少數民族的歷史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此外，劉禹錫還寫了一些描繪祖國山川景色的好詩。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九華山、秋江晚泊、望洞庭、沓潮歌等，描寫了天壇的風雨晦暝，九華山的天矯奇險，秋江的晚霞，洞庭的波光以及海潮的奇觀，都具有形象鮮明、美不勝收的特點。九華山歌還暗寓懷才不遇的牢騷，與柳宗元的山水游記有相似之處。

應該指出，劉禹錫的詩歌中也包含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愛與僧徒、道士交往，和他們酬贈的詩篇常常流露出消極思想。他愛讀莊子，自稱「爲愛逍遙第一篇，時時閑步賞風烟」（和裴相公傍水閑行）。莊子的虛無主義、相對主義，在他的作品中時有反映，如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槍榆水擊各逍遙。」酬樂天見寄：「華屋坐來能幾日，夜臺歸去便千秋。」這雖然是在特定環境裏產生的心情，不能代表劉詩的主流，但畢竟是不健康的，閱讀時應注意批判。

劉禹錫曾說：「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董氏武陵集紀）他強調「體變」和「調殊」，包含着重視詩歌藝術創新的意思。他的詩歌不僅和大曆時期詩人的創作體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和、長慶間重要詩人相比，也是獨樹一幟的：既不像韓愈那樣奇崛怪僻，又不像白居易那樣淺俗直露，而是另有一種風味。其特點是：取境優美，精煉含蓄，韻律自然。

劉禹錫很重視「取境」。他所「取」之「境」情致和語言都是優美的，如竹枝詞九首之九、浪淘沙詞九首之六、插田歌等歌頌了勞動之美，創造力之美，讀了能喚起讀者把人的本質力量作爲藝術美來歌頌的

豐富感受。他所寫的愛情詩情操高尚，令人神往。從語言上說，劉禹錫的詩歌很重視文彩。唐張爲所撰詩人主客圖列劉禹錫爲「瑰奇美麗主」的「上入室」一人，主要是從詞彩方面考慮的。他的詩歌文彩炳耀，語言雅麗，却不像李賀那樣「理不勝詞」，也不像其他某些中唐詩人那樣使腴詞累骨，而能做到詞意相宜，恰到好處，如浪淘沙詞九首之二：「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造語流麗妍捷，形象鮮明生動，在畫面的安排上能「狀飛動之勢」（文鏡祕府論南卷引皎然語）。後來陳師道的絕句：「無端一棹歸舟急，驚起鴛鴦相背飛」，全從劉詩化出。他常用比興手法增強語言的美感和形象性，如以「白銀盤裏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綃剪出玲瓏翅」（吐綬鳥詞）來刻畫吐綬鳥的毛羽之美，以「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脫）來象徵白居易詩境的雅麗自然，都新穎可喜，形象優美。

劉禹錫認爲詩歌應力求「片言明百意」，「境生於象外」（董氏武陵集紀）。前者主要指精鍊，後者指含蓄。他的詩歌正好兩者兼而有之。方回用「句句精絕」（瀛奎律髓卷二七）、「言言精確」（瀛奎律髓卷三）來形容這一特色，可謂十分恰當。名篇如：石頭城、和樂天春詞、阿嬌怨等歷來以精警絕倫著稱。名句如：「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秋日送客至潛水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都言簡意豐，耐人尋味。劉禹錫的詩歌用典精切，如顧嗣立寒聽詩話說：「劉賓客詩：『樓中飲興同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謝朓，讀之使人不覺。」他的詩歌含蓄有致，顯然與用

典精切有關，但主要還是得力於構思的巧妙。他長於用曲筆，如烏衣巷詩，施補華說：「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峴傭說詩）又如望夫石詩，用「望來已是幾千載，只是當時初望時」，來寄託自己始終不渝的戀闕望歸之心，命意也極為委婉曲折。在各種題材的作品中，劉禹錫的懷古詩最多韻外之致。君山懷古、荆門道懷古、經檀道濟故壘、漢壽城春望、晚泊牛渚等，往往從眼前的景物出發，馳騁豐富的想象，在對歷史現象作深刻藝術概括的基礎上，對古今隱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點染，因此形象鮮明而又發人深思。

劉禹錫有感於當時的某些樂府詩「不能足新詞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紀）的現象，努力創作能「度曲」的「新詞」。竹枝詞、楊柳枝詞就是這種努力的碩果。魯迅先生說：「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偶有一點爲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爲新的養料。」（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劉禹錫正是這樣。他被民間傳唱的竹枝詞熾熱的生活激情和淒涼怨慕的曲調吸引住了，感到耳目一新。他所作的竹枝詞流傳至今的兩組共十一首。從音樂美的要求來看，每首的前兩句主要吸取了七絕聲律諧婉的特點，後兩句又保持了民間傳唱的竹枝詞在曲調上淒涼怨慕的特點，兼有兩者之長，做到和諧和拗怒的遞用，並採用諧聲雙關、重疊迴環等藝術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聲。由於他寫的竹枝詞特別發調動聽，所以到宋代仍在民間傳唱。邵博聞見後錄卷十九云：「夔州營妓爲喻迪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解，尚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胡仔也曾親耳聽到蒼溪舟人唱「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蒼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可見其藝術生命力的強大。

劉禹錫的楊柳枝詞比較接近於絕句，但在節奏的明快和韻味的動人方面勝於絕句。張歷友云：「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詞也。其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師友詩傳錄）從白居易對洛陽歌伎演唱楊柳枝詞的描寫來看，這種曲調如啾鶴哀猿，玉潤珠圓，相當優美。除此以外，劉禹錫的其他詩體也潛移默化地受到民歌曲調的影響而增強了音樂美。他的律、絕、古詩，大都以聲情並茂見長，流暢、諧婉、自然，猶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類古體，也具有民歌的音樂美。清翁方綱譽之為「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石洲詩話卷二）。新體詩如瀟湘神、醉答樂天、歎水別白二十二、同留守王僕射各賦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等，句式、節奏、用韻都與律詩不同，逐漸向長短句演變。後兩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詩，顯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詩的啟發而又有所創新。這些句式長短不齊的新體詩，較之整齊劃一的律詩更適合於配樂歌唱。劉禹錫還寫有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兩首，明言按照憶江南的曲調來填詞。這是我國文學史上開始出現依曲填詞的記錄。明胡震亨說劉詩「語語可歌」（唐音癸籤卷七），基本上符合事實。

劉禹錫在唐詩發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也比較大。明楊慎說：「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人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卷七六詩品）李商隱、溫庭筠、杜牧、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徐文長、袁中郎、唐寅、鄭燮等都曾經從劉詩中吸取過營養。特別是劉禹錫的竹枝詞，至近代仍製作不衰。

劉禹錫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李翱曾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劉禹錫把這句話援引入自己文章中（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表明他同意這一觀點。宋謝采伯對劉禹錫在古文運動中的歷史地位評價比較公允，說：「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密齋日記）劉禹錫嘗稱：「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說明他對先秦兩漢的散文頗有研究。他從事古文寫作的時間也比較早，貞元十年就鄙棄「沉溺於浮華」的駢體文，明確提出文章應該是「見志之具」（獻權舍人書）。後來又進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唐故相國李公集紀），並強調「文章之用」，強調「筆端膚寸，膏潤天下」（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這些觀點，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理論是一致的。

劉禹錫特別重視論說文的作用。他說：「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這裏所說的「立言」就是指論說文。劉禹錫的散文創作以論說文的成就爲最大。他自己也以此自負，在祭韓吏部文中說：「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這一說法，大致上符合實際情況。他的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比較廣泛，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提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